

文化景观

视角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 要领、原理、应用

陈谨 马湧 李会云 张位中 著

WENGHUA JINGGUAN
SHIJIAO DE
LUYOU GUIHUA
LILUN TIXI

Yaoling Yuanli Yinavong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项目号：0082704132126

文化景观

视角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 要领、原理、应用

陈谨 马湧 李会云 张位中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勇军
责任校对:王 平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景观视角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要领、原理
应用 / 陈谨等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14-6292-8

I. ①文… II. ①陈… III. ①旅游规划—理论体系
IV. ①F5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3113 号

书名 文化景观视角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要领、原理、应用

著 者	陈谨 马湧 李会云 张位中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292-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序 言

纵观国内旅游规划发展史，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设立专门的旅游局以来，国内旅游发展逐渐步入正轨。1978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日，国家建委城建局和广东省建委在肇庆召开了风景旅游城市规划座谈会，集中探讨了风景园林的保护和管理体制等问题，这意味着国内旅游规划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在之后的时间，旅游业作为产业部门的地位被确立和认可，并且形成了一系列与旅游规划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包括《森林公园总体设计规范》（LY/T5132—95）、《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SL300—2004）等。

然而，这些技术性的规范和标准只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加之相关技术规范 and 标准众多，容易因多方指导而造成规划的混乱，同一个旅游景区在旅游规划编制中可能会因为参照的规范和标准的不同而制定出不同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技术性的规划规范和标准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旅游规划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出发，寻找一套系统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和核心理念，以此来确立旅游规划之本，实现旅游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这套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之所以是旅游规划理论体系的核心，其根本原因首先就在于文化景观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整体性与旅游规划的时空诉求相契合。无论是广义的文化景观还是狭义的文化景观，它们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整体性。时间上的连续性是指从人类智

慧和活动开始便加诸于其上并一直延续至今，中间虽然有可能经历了文化的变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其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一直延续并保留至今。空间上的整体性是指文化景观不是一个割裂的个体，而是一个由人类智慧及活动与自然景观融合的复合体，因此文化景观的核心不仅仅在于景观的形态本身，而更多的是其景观形态背后的人文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同样，作为规划也需要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整体性。规划的本意是：“规者，有法度也；划者，戈也，分开之意”。规划的基本意义由“规（法则、章程、标准、谋划，即战略层面）”和“划（合算、刻画，即战术层面）”两部分组成。而这两部分都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含义，“规”是法度，包含了时间的法度和空间的法度，“划”是分开，包括从时间上分开和从空间上分开。因此，规划从时间尺度来说侧重于长远，即对目标事件进行合理的时间上和程序上的安排和组合，从空间尺度来讲就是侧重于空间上的整体性，即对空间内各部分之间进行协调和组织。因此，文化景观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整体性与规划的时空诉求之间具有很高的吻合度。

规划如此，旅游规划亦是如此，对旅游规划而言，时空组织和安排也是其核心和关键的内容。旅游规划涉及众多的学科体系，包括地理学、历史学、市场学、经济学、景观学、管理学和生态学等，其中地理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范围主要是进行区位条件即对资源等景区条件的分析，对旅游区和功能区的划分等；历史学主要是用于分析人文旅游资源，分析和保护文化遗产等；市场学主要用于分析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市场定位和营销策划；经济学主要用于分析旅游需求，投入产出以及供给与需求等；管理学主要用于分析旅游管理体制；生态学主要用于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可持续发展等；景观学主要用于具体的景观设计，重点旅游城市创意性规划等。在旅游规划的各学科体系中，景观学是旅游产品从资源转化为产品的最关键和最核心的环节，无论资源多么优越，都需要通过景观学对其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梳理，形成具体的景观表现，进而实

现其作为旅游产品的核心功能。由此可见,景观学在旅游规划学科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在景观学当中,文化景观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丹麦设计师杨·盖尔认为,规划的先决条件是社会关系与建筑布局、知觉、交流与尺度以及室外空间的生活,可见对规划而言,其注重的不光是自然景观和硬件设施,更注重硬件设施背后的人文活动,包括人与人的交流以及室外空间的生活,而文化景观正是人文活动与自然景观的复合体,是实现旅游规划中人与人、人与物交流的最佳载体,是旅游规划理论体系的核心。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文化景观与旅游规划具有相同的物质载体。文化景观是人类智慧加诸于自然景观之上形成的,它包括外显的景观实体和内涵的景观价值,外显的景观实体即人肉眼可见的,可以通过具体的景观形式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景观实体;而内涵的景观价值则是景观实体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标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景观。旅游规划始于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分析和整合,而文化景观自身既包含了自然景观的外显形式,又包含了人文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内在含义,所以文化景观与旅游规划有着相同的物质载体。

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地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当人类的智慧加诸于自然景观之上时,便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景观。这些文化景观一直存在并且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审美价值等各个方面。在古代关于历史地理的书籍当中,虽然没有出现“文化景观”的字眼,但是关于文化景观的记载和描述却可见一斑。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就包含了关于自然与人文方面的景观描述,在自然方面有山、川、泽、林以及动植物、天象等;人文方面则有邦国、民族、民俗、物产、信仰、服饰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以河川为纲,记述了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有水文地理、地貌和生物地理;在人文地理方面有城市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农业地理等,除此而外还有较多沿革地理和地名方面的珍贵资料。再如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

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肇域志》等都涉及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方方面面。

纵观这些文献记载,虽然没有明确地对文化景观做出分类和描述,但其所记载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文化景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的文化景观等同于人文景观的概念,而这也是在文化景观这一概念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之前人们关于文化景观概念的理解,也就是广义的文化景观,即“人类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利用自然界所能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

20世纪20年代,国外开始广泛使用“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到80年代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也逐渐在国内被广泛应用。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在法国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实施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的评估标准,确定了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并且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随后在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可见,随着“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以及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保护的范畴,文化景观的概念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缩小,形成了狭义的具有可操作意义的概念。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的《实施世界遗产保护的操作导则》,文化景观被分为3个主要类别。一是人造景观(Designed landscape):由人类设计并创造的景观。包括出于审美原因建设的花园和园林,且这些景观常与宗教等纪念性建筑或建筑群相联系。二是有机演变景观(Organically evolving):源起于社会、经济、管理或宗教功能的历史景观,在不断演变回应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转变,形成现在的形态。还可细分为:持续性景观(landscape-continuous)和残存(或化石)景观(landscape-fossil)。三是关联性景观(associative landscape):

也称复合景观,此类景观的文化意义取决于自然要素与人类宗教、艺术或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多为经人类改造的自然胜境,如风景区、宗教圣地等。

由于文化景观的概念经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演变过程,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文化景观的概念也是见仁见智,美国地理学家索绪尔从最广义的文化景观入手对其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国内学者李旭旦教授将文化景观定义为:“地球表面上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朱竑和司徒尚纪在《近年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中提出:“一般认为文化景观是居住在其土地上的人的集团,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上叠加了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景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本书根据作者从事多年的旅游规划工作经验和总结,从文化景观的崭新视角,通过对文化景观的梳理和解读,依托文化符号学、旅游伦理学、文化人类学、景观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以及交往空间理论、服务管理、可持续发展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理论,在分别构建旅游规划的文化符号体系、旅游伦理体系、特质文化体系、生态网络体系、交往空间体系、服务管理体系等相关体系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套系统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以文化景观为基石主轴线,依托文化符号学构建旅游规划的主体,借助景观生态学构建旅游规划的客体,利用旅游伦理学构建旅游规划的价值标准,并在交往空间的场所引领下,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和目的,构建全新、全面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

基于文化景观视角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构建更好地融合了多学科、多领域的相关内容,更切合市场发展的需求,是一种新型的“天人合一”的旅游规划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不仅探索了一条旅

游规划独具特色的理论研究路线，开拓了旅游规划理论体系研究的先河，重点在于其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可运用于多个层面的旅游规划之中，能够真正实现理论与方法同步进行的目的。

编 者

2012 年 10 月

前 言

一、旅游规划发展历程概述

（一）国外旅游规划发展历程

科学化的旅游规划工作，是在近现代兴起并发展的。它最先出现在美国，1958年的夏威夷州规划（State Plan of Hawaii）可以被看做是现代旅游规划的先驱，旅游规划第一次成为区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法国、英国相继出现了正式的旅游规划。1963年联合国国际旅游大会强调了旅游规划的重大意义。随后，马来西亚、斐济、波利尼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均兴起了旅游规划。70年代起，旅游规划的观念开始被许多国家、地区及旅游规划组织所认同和重视。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并参与了菲律宾、斯里兰卡、尼泊尔、肯尼亚等国的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吴人韦，2000）。世界旅游组织于1977年出版了有关旅游规划的全面综合性文件（WTO，1977）。80年代，旅游规划普及到了许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并在发达国家进一步普及和深化，同时还出现了对现有旅游规划的修改和更新。近期的旅游规划比以往更强调旅游开发的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旅游规划中得以体现。随着规划的发展，人们更多的将重点放在如何有效地实施规划上（Inskeep，1991）。Burns（1999）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规划观念的变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导致的旅游规划理念和实践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国外旅游规划发展历程

时代	公共部门规划 主流范式	旅游规划发展阶段	典型旅游特征
20 世纪 50 年代	战后重建，氛围乐观，进一步实施和采用。	事实上不存在公共部门旅游规划。	虽然受战后朴素主义限制，但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产生了国际短距离旅游的萌芽；商业飞机启用，假日野营地在英国继续盛行。
20 世纪 60 年代	逐渐认识到规划与社会研究的共生关系；分区、土地清理、城市群；认识到社区包含多种邻里关系；整体规划指导专项规划；以科学的方法确定经济体的发展目标。	官方不切实际的旅游形象定位；没有将旅游与其他经济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政府将投资动机和运作放在首位；缺乏对旅游部门的批评性分析；不关注规划实际；整体规划蓝本得到普及。	科技发展、闲暇时间的增多和旅游动机的产生使 20 世纪 60 年代迎来了大众旅游时代；追寻大自然的旅游形式占统治地位；穿越北非和印第安的“嬉皮士线路”。
20 世纪 70 年代	从配置规划转向寻求在规划框架的指导下使规划合法化的创新性规划，用已有制度设立新制度；公共规划这是可调配资源的企业家；反馈机制的不断应用。	旅游规划达到顶峰；奢侈旅游胜地成为焦点；“规划者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思想；针对目的地自我需求和期望的旅游规划中缺乏政治影响；社区参与观念融入主流旅游规划；旅游企业树立国际发展战略。	技术在航空（飞机更大、更快、更便宜）和电子信息领域飞速进步；确保短途或跨区域旅游的强劲增长；阳光式旅游仍然是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并不断扩充。

续表

时代	公共部门规划 主流范式	旅游规划发展阶段	典型旅游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	英美政治措施更强调企业家意识，对城市更新采用“放手”管理方式；公共财产的私有化；消费和形象建设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零售业从城市中心转向郊区；意识到文化产业可以帮助重建衰落的工业经济。	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引发了对建立以综合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框架的需求；例如，成本收益分析使部门化战略开始出现；北美地区开始意识到社区参与的意义。	这一时期，复合型经济财富造成国际旅游需求缓慢增长；经验丰富的旅游者不满足于“4S”压迫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而是在消费主义和“越多越好”的观念的影响下向往更自然、更新奇和未开发的旅游目的地；担心旅游可能导致艾滋病扩散。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地方利益作为规划基础所建立的网络体制，成为指导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合作的参考依据；越来越多的贫困国家（厄立特里亚、也门、柬埔寨、越南、加纳、乌干达、阿尔巴尼亚等）以旅游业来推动经济发展。	如果缺乏周详的规划，第三世界国家将无法从旅游发展中得到收益；旅游目的地管理需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环境学家、人力资源专家和物质基础设施规划者的共同参与。	亚太地区旅游飞速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进行沟通；“新旅游者”寻求个人文化感知的自我实现（如在质和量上的权衡）；生态旅游和特殊兴趣旅游出现，大众旅游增长缓慢；冷战结束后到东欧国家旅游更为方便。

（二）国内旅游规划发展历程

中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成立旅游局，而国家级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始于 1979 年。张广瑞（1993）从规划编制角度将中国旅游发展规划的发展初期划分为 4 个阶段（4 种类型）：（1）地理专业人员开辟新领域，侧重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规划；（2）城市规划人员（包括城建、风景园林部门和建筑规划院校）在风景名胜区

和历史文化名城领域大显身手，利用原有较好的规划规范和硬件技术，以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为主要领域，编制了为数不少的以物质规划为主的旅游规划；（3）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制定全国或区域性的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自1986年国家将旅游发展列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之后，国家旅游局着手制定全国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同时也要求地方主管部门编制当地的规划；（4）旅游规划大发展，也就是民营规划咨询机构的涌现。范业正和胡清平（2003）根据旅游规划的重点内容将中国旅游规划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1）资源导向型时期（1979—1989年）：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主；（2）市场导向型时期（1990—2000年）：以旅游形象和市场营销为重点；（3）产品导向型时期（2001年至今）：以旅游产品体系建设为中心。随着旅游规划的发展，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旅游概念性规划这一旅游规划的新类别（刘德谦，2003；王建军，2001）。

范业正和胡清平（2003）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未来旅游发展的几大趋势：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变；旅游规划将更加具体、深入和专业，景区级的微观规划和企业咨询性的规划将增多；旅游规划的精致型发展；境外旅游规划和咨询单位的介入和竞争；更加重视人文、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吴人韦（2000）认为旅游规划的发展趋势应是：旅游规划技术的整合，走向合成的动态规划过程，走向网状的实施监管。

虽然相对于其他规划研究，旅游规划是个年轻的领域，但世界各国对旅游规划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许多作者已经编纂专著或撰写论文对旅游规划的基本模型、一般范式进行了探讨。例如冈恩和瓦尔（中译本，2005）在其《旅游规划：理论与案例》一书中对旅游规划的基本概念、一般理论和经典案例进行了权威剖析，成为旅游规划领域最广为人知的专著之一。Inskeep（1991）在其《旅游规划：综合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一书中从可持续旅游角度归纳了旅游规划的一般程序和编制方法。Inskeep（1994）还对世界旅游组织就国家和区域旅游规划编写出版了一些方法与实例的著作。Hall（2000）对旅游规划的政策、过

程和利益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此外, Kaiser 和 Helber (1978) 的《旅游规划与开发》、Stynes 和 O'Halloran (1978) 的《旅游规划》、Adejuwon (1993) 的《旅游规划基础》、Veal (2002) 的《休闲与旅游的政策与规划》等都是关于旅游规划体系的研究专著。

中国旅游规划时间的积累推进了国内旅游规划方面的学术研讨。国内研究界对旅游规划的特点、性质和一般规范的探讨是在总结、积累已经实践的旅游规划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吴承照, 1994)。范业正和胡清平(2003)将中国的旅游规划研究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1)前期探索阶段(1980—1986年):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旅游资源评价和开发思想逐步形成,为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奠定了基础,如郭来喜(1982a)的《旅游规划研究初探》是中国对旅游规划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2)实证研究阶段(1987—1996年):此阶段对旅游规划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的评价方法,对旅游开发和规划偏重于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理论深度不足,但已有学者开始引入国外旅游规划的理论和方法,为国内的旅游规划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邹统钎, 1993、1996);(3)理论研究阶段(1997年至今):旅游规划研究的重视程度得到提高,一系列旅游规划学术论著及旅游规划案例相继出版。

21世纪初,随着对旅游规划时间研究的增加,一些带有理论性总结的著作开始在中国出现。其中旅游规划概论性的著作作者主要包括王兴斌(2000)、黄羊山(2004)等。规划案例总结、汇编的著作作者包括保继刚等(2003)、王云才(2004)等。专题性的著作包括吴殿廷等(2003)对水体景观,刘滨谊等(2002a, 2002b、2003、2005)对自然原始、人造生态、历史文化和纪念性景观,魏小安(2002)对目的地发展,沈祖祥(2007)、杨振之(2007)对旅游策划等的研究著作。一些省市旅游总体规划的正式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参考的模板,其中包括北京市(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 2000)、湖北省(湖北省旅游局、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2003)等。出版的工具书性质的著作包括

唐子颖、吴必虎等译《旅游与游憩规划设计手册》（鲍德—博拉和劳森，中译本，2004），刘家明、刘爱利翻译的《旅游目的地开发手册》（戈弗雷、克拉克，中译本，2005）。

（三）旅游规划发展趋势

在系统分析旅游规划起源、历程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作者根据多年从事旅游规划工作的经验，认为旅游规划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如下表的趋势。

未来旅游发展规划的趋势

主体	趋势	分析
规划供给	政府主导向市场导向转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由于政府规划市场庞大，从而形成了体制色彩的政府主导型规划。但随着旅游业深入的发展，市场化进程以及需求将改变旅游规划供给，各地的旅游规划将逐渐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导向规划转变。
规划决策	主观决策向规范制度化转变	法制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全民法制意识的增强，必将改变呈现浓厚主观色彩的旅游规划，其决策方面的约束机制的建立，亦将有助于整个旅游规划运作的法制体系的完善。
规划方向	宏观方向向微观落地规划转变	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旅游规划将越来越侧重于可操作性和落地实施性。因此，下一步旅游规划将不仅停留在宏观规划的层面，而且要在宏观框架的指导下，真正实现旅游规划的实施。
规划方法	感性规划向数字化规划转变	在以往的旅游规划中，多数的要素分析均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解读，缺乏独立的技术手段，从而呈现出感性化色彩的问题。而数字规划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规划，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旅游统计制度、旅游信息数据库网络与旅游市场调查体系，并以旅游市场研究为基础的旅游参数、指标体系、策划体系，最终以丰富的数据和图纸表达旅游研究和规划思想的。数字规划是一种现代理性规划，它的出现必将提高旅游规划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续表

主体	趋势	分析
规划形态	单一规划向多元规划转变	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日益膨胀,以及旅游业发展多样化的格局,旅游规划的形态也将随之变化。从单一的观光类规划到特色休闲与游憩生活为一体的多元规划转变。
规划方式	封闭规划向开放规划转变	以往的旅游规划中,“就规划地论规划地”的问题较为突出,呈现出一种封闭式的规划,而随着旅游规划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未来的旅游规划将设计广泛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并且融合社会各方面的价值以及各层面的利益相关者,趋向于开放性的规划。
规划主体	独立小组向多科合作转变	旅游规划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内容,未来的旅游规划将逐渐摆脱分散的、单纯的个人行为,朝着一种跨学科、聚焦型、多方参加的集体性协作的方向发展。
规划实施	部门实施向社会协作实施转变	随着旅游产业地位的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增强,大旅游格局将逐渐形成,旅游发展将涉及社会各阶层的相关利益,各个群体都将关心旅游的发展和旅游规划的进程,由此,旅游规划实施将不再是旅游部门的独角戏,规划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行业协会组织、社区居民将充分融合交流,会逐渐的参与到旅游规划之中,相关部门与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协作推进,围绕旅游形成功能耦合、规划协调,分解规划实施目标任务,保证规划得到实施。

二、当前旅游规划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动态分析

(一) 国外旅游规划理论研究概况

国外对旅游规划理论的研究始于1963年的波兰区域和城市规划专家B. 马列士,在其著作《城市建设经济》中提出了门槛分析法(Threshold Analysis)。该方法起初应用了城市发展的门槛分析,为城市发展可能的综合评价及规划方法。之后的1968年,B.

马列士在南斯拉夫南亚德里亚地区的规划中，第一次将门槛分析法应用到旅游发展规划之中。

随着门槛分析法的不断探索与发展，之后产生了终极门槛方法，其概念为：生态系统的极限承载力，超过这一极限，生态系统就不能恢复原状和平衡。由此，在旅游规划中，门槛分析法对旅游目的地环境承载力、基础设施规模以及旅游目的地环境容量分析展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随后，1979年Gunn出版了《旅游规划》，并于1988年重新整合出版了第二版。1985年，Murphy相继出版了《旅游：社区方法》。之后，以墨菲（Murphy，1991）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倡导旅游规划中的社区参与性。

几年来，虽然国外相关专家学者仍然在不懈地对旅游规划的理论进行研究，但最终形成一套系统理论体系和方法的研究却甚微。

（二）国内旅游规划理论研究概况

国内对旅游规划理论的研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进行的，起步相对较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王兴斌首次提出了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流程：市场—资源—产品—市场。王大悟、毕吕贵则认为，中国的旅游规划无法避免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导致旅游规划的重心出现转移，开始从传统的市场和基础设施的规划向旅游资源的规划转变；从单纯技术性的规划向经济与技术并重的方向转变。

吴人韦^①总结旅游系统的整合性规划，认为意义在于促进区域有关旅游的社会经济——物质环境整合为旅游系统，在旅游规划的区域层次上实现与社会经济规划以及区域规划相融合的目的，同时成为同级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区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德谦^②在2001年提出“概念性旅游规划”，并进一步阐述了

^① 吴人韦. 旅游规划原理（全国旅游院校统编教材）[M]. 旅游教育出版社，1999

^② 刘德谦. 旅游规划需要新理念——旅游规划三议 [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4（5）：9-12